

「小說」作為一種現代文類：研究計畫簡介

Introduction to the “Fiction as a Modern Literary Genre” Project

林毓凱 (Lin Yu-kai) *

一、研究背景

無論在海外漢學界，還是華語學術圈，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小說」是否能準確翻譯英文的 fiction 或 novel，或 fiction、novel 能否完整表達中文「小說」的複雜意涵，一直是個惱人的問題，關於此議題學界向來有許多討論，討論方向大概可分三種路線。

第一種路線可被稱為「小說原生論」，抱這種觀點的學者多半認為，中國與西方的「小說」觀有先天與根本上的區別，中國小說有自身完整的體系，且歷史久遠，只是到了近代因西風東漸才發生概念上的轉變，持此觀點的論者因而強調中國傳統內部的元素與構成。第二種路線則是廣為人知的「衝擊反應論」，這種路線側重「小說」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轉變，認為現代的「小說」觀念乃是被動地接受西方翻譯小說的影響，從而產生質和量的轉變，雖然「衝擊反應論」不否認中國傳統先天的文化因子，但更傾向強調西方文化的後天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小說概念蛻變。第三種路線則是「日本轉來說」，這種說法的學者認為，現代「小說」乃由西方，經由日本，再傳入中國，強調日本中介的因素，由於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受日本影響甚大，且當時許多西洋小說的中譯本實來自日譯本，因此小說東來的論點，在大方向上，多數學者大概也會同意。

這三種研究路線雖不盡相同，但箇中差異不大，譬如強調東西差別的「小說原生論」與強調中西碰撞的「衝

擊反應論」同樣預設中國文化傳統的本質與存在，強調日本中介的「日本轉來說」也可以是「衝擊反應論」的變奏與異本，綜而觀之，三種路線都預設了某種本質化的中國或西方「小說」概念。

二、研究動機

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學術發展裡，這三種觀點確實已帶給我們許多有趣的見解，也提供當代學者相當有用的研究範式。然而，在現代文學觀念興起的議題上，這些觀點仍面臨兩種難題。第一個難題是 fiction 與 novel 兩個概念在西方脈絡自身的轉變與模糊性，第二個難題是「小說」概念本身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游移性。

在西方脈絡裡，fiction 與 novel 成為比較清晰的文學概念是 18 世紀的事情。英國中產階級的崛起造就了一群對世界文化擁有高度好奇的讀者，識字率的普及和出版社的增長，讓小說家成為一種職業的可能。此外，長期關注西方小說發展的凱瑟琳·凱樂格 (Catherine Gallagher) 也指出，從 17、18 世紀開始，fiction 一詞逐漸脫離原本虛偽、虛構、欺騙、模仿等意思，而逐漸變成一種寫作方式，甚至一種文類，這種轉化最重要的因素就在於這時期作者對於「專有名字」的「非指涉性」的運用。

舉例來說，《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 (Daniel Defoe) 講述了一擁有特定名字的個人，從而創造出一

* 作者為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與文明學系博士候選人。

個擬真的身分，但這個身分卻又不指向特定的現實人物，作者因而建立了一個可信的、個人化、但同時又具有普遍認同效果的敘述，這種書寫上的雙重效果造就了 fiction 作為一種現代文類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fiction 與 novel 在意義上仍有所區別，但在英語世界的許多情況裡，fiction、novel 仍常被混用，這種情況也出現於學術著作裡，這或許意味著即使在當代的英文語境裡，西方的「小說」概念仍保有著某種複雜性與模糊性。「小說」概念在中國文學傳統裡也有其游移性，而這種游移性仍持續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中文語境裡，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

在中文文獻裡，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莊子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換言之，對莊子而言，小說只是博取美名、偏離正道的話術。西漢的桓譚在其《新論》也認為，小說雖「有可觀之辭」，但本質仍是「叢殘小語」，無足輕重。東漢的史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則有九流十家之說，認為小說「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因而居十家之末，班固甚至引用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的說法來說明小說的瑣碎價值。

先秦兩漢對於小說負面的看法大致影響中國後代的小說發展，使其一直無法成為史家與文人的研究重點，作為一種界限不甚明顯的小說只能涵蓋在「史」的大範疇中來理解。直到了 16 世紀，明朝的胡應麟才首次將小說做了比較系統性的分類，他將小說分成六類：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相較於先前班固九流十家的說法，看似一大進步，然而這樣的分類法所呈現的小說觀實仍相當模糊：故事情節較為濃厚的唐傳奇和簡短紀實的六朝志怪並列，具有史官辨明謬誤的辨訂和宮廷勸戒的箴規共存，我們並無法從這分類上得到關於小說更清楚的定義。

三、研究問題

一般看法認為，「小說」作為下九流的文類要到晚清梁啟超提倡「新小說」才被打破，這種說法被普遍接受。梁啟超的「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幾乎已成梁氏最佳標語。然而，梁啟超的「新小說」是否就代

表現代西方文學定義下的 fiction 或 novel 嗎？或更進一步問，梁啟超的「新小說」是文學概念嗎？這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若細讀其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我們可以發現梁啟超對於小說的藝術價值隻字不提，對於文學一詞的提及也僅見其一，對他而言，小說的價值來自於其宣揚政教、廣開民智的作用，小說因而是被動的工具，不是創造的活動。不過這種說法並非梁氏所創，許多梁啟超關於小說的論點實來自於其導師康有為的著作——特別是康有為 1896 年編纂的《日本書目志》，換言之，要理解梁啟超的「新小說」，我們無法繞開對康有為的研究。

康有為編纂《日本書目志》的目是為了介紹西方現代知識，他認為日本已經廣為吸收西方知識，而中日文字又多為互通，因此透過編纂介紹西方知識的日本書籍，是引介西方現代性最便捷的方法，這個說法日後則不斷被梁啟超重複。在此書目中，康有為將所有的西方知識分為十五大門，而每大門再細分為其他小類。有趣的是，「小說」、「文學」、「文字語言」、「美術」並列為四種不同大門，這與現代小說作為文學底下的一種文類的分法明顯不同，除此之外，小說一詞還出現在其他不同的學門裡。

譬如在教育學門裡，康有為在一註釋中提到「教育小說」；在政治學門中，康有為在論及保存文教的重要性時，也提及小說一詞；在美術學門下，康有為亦用完整的段落說明小說大於經書的影響力。即使小說一詞在各個「門類」中不斷出現，但在看似與現代小說最相關的「文學」和「文字語言」兩個類別裡，小說一詞只出現了三次。最後，在「小說」的學門裡，小說一詞又以極為多樣的方式出現，所提及的小說名目計有：兔園小說、學藝小說、偵探小說、裁判小說、人情小說、改良小說、朝鮮小說、歐洲小說、政治小說、社會小說、政治滑稽小說、政教小說、新案小說、時事小說、鐵道小說、商業小說。

這些繁複的小說名詞有些指一種文類（譬如政治小說、偵探小說），有些指一部作品（譬如兔園小說其實是曲亭馬琴在江戶時代完成的一本奇談集），此外還有一些內容來歷還有待考證的小說名目（譬如鐵道小說、裁判小說）。這種文類、書名混雜的列舉方式，顯示了

小說作為一模糊概念仍然持續到晚清的中文語境中。

如果中文的「小說」與英文的 fiction、novel 各有其模糊性與複雜性，再加上日本中介的因素，中西文類對譯的問題在處理上就更加困難且弔詭，到底對中、西、日文化與文本的掌握到底要多全面才得以認定「小說」與 fiction 或 novel 相對應的問題？當下的三種研究路線（「小說原生論」、「衝擊反應論」、「日本轉來說」）固然可繼續提供我們思考此議題的空間，但與此同時，我們能不能開創第四種進路？這問題是本研究的問題核心。

四、研究方向

本研究認為這第四種可能的路線可從三方面來著手：第一，小說概念之雙重指涉性的建構，第二，小說史的書寫，第三，文學作為一種世界語言的想像；第一者是後兩者產生的效果，後兩者則是前者的建構前提。

我們以現代中文語境的「小說」為例。雖然晚清知識分子及西洋傳教士開始用小說一詞來指涉外國著作，但這並不表示「外國文學」作為一獨立概念已成型，事實上，在「外國文學」的概念化過程中，傳統中國的小說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英國小說家萊頓（Edward Bulwer-Lytton）在 1841 年寫的 *Night and Morning*，其中文翻譯在 1872 年首次在《申報》的副刊——《瀛寰瑣記》——以「昕夕閒談」的標題發表。值得注意的是，此譯作前還有段引文，說明此作品之於中國讀者的重要性，引文一開始就敘述了一段關於「小說」的簡短歷史：

小說之起，由來久矣。虞初九百，雜說之權輿；《唐代叢書》，瑣記之濫觴。降及元明，聿有平話，無稽之語，演之以神奇淺近之言，出之以情理，於是人競樂聞，趨之若鶩焉……今西國名士，撰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彩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犀者也。因逐節翻

譯之，成為華字小說，書名昕夕閒談，陸續付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猶其淺焉者也。¹

引文一開始簡單描述漢、唐、宋、元、明小說發展的文字本身並不特殊，但作為理解西方作品的理論框架，就有趣了。我們可以做以下推論：正因為 fiction、novel 與「小說」的相對應關係尚未成型，因此若要讓晚清的中國讀者理解這部「外國作品」，引介者還是只能透過利用傳統小說的概念以及其在中國傳統中所被（迫）預設的價值，來介紹域外著作。也因如此，從引文作者的眼光來看，此部西洋作品的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其外國屬性，而在其蘊含的道德意義和廣開民智的作用，這部「西國名士」之作和任何其他在中國書寫傳統中被歸類為「小說」的中文作品並沒有脈絡上的區別，誠如引文作者所說的：該作品原本雖以異國文字寫成，但重要的是它現在已成為一部「華字小說」，而作為一部「華字小說」，其首要價值就是宣揚道德，其基本性質與作用與其他以華文書寫的小說並無不同，唯一的差別僅在於前者還有廣中土之士見聞的附加價值。

這顯示了小說一詞仍被想像為一個充滿異質、多樣性的繁雜概念，因此嚴格區分「中國小說」和「西洋小說」的脈絡異同並不是那麼重要。雖然小說一詞在晚清已被挪用來理解、衡量、評價非中文的作品，但具有獨立文類意義上的「西洋小說」尚未存在，而也因具獨立脈絡意義的「西洋小說」尚未成型，相對意義上的「中國小說」概念也頗為模糊，譬如梁啟超、康有為等大力提倡小說的晚清知識分子仍常用「我朝小說」或「中土小說」來指涉用中文書寫的作品，這顯示出中文語境下的小說一辭，其雙重指涉性尚未被建構完成，因而還有混用的空間與狀況。「中國小說」一詞，據筆者初步調查，可能要到 1904 年才首次出現。

本研究也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中國小說」如何變成一獨立文學概念的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線索。此書出版於 1923、1924 年，可以被視

1 該引文標題為〈昕夕閒談小敘〉，刊於《瀛寰瑣記》1873年1月號。另收於阿英，《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95。

為「中國小說」概念史書寫的第一部著作。魯迅在序言開宗明義寫到：「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²魯迅「中國小說自來無史」的大膽宣言或許應該作如下解讀：關於「中國小說」的概念及其歷史，雖然偶爾被中外人士提及，但關於小說的完整文學史仍尚未被完整書寫，《中國小說史略》則填補了那個空缺。

魯迅從先秦兩漢談起，將遠古神話與傳說視為「中國小說」的根源，小說歷經六朝的發展，到唐代才有了「始有意為小說」的重要轉折，六朝以後的宋、元、明、清作品，魯迅也如數家珍，一一詳述，分門別類，建立線性的發展順序，可以說，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的建構上扮演了司馬遷的角色，寫的是從古迄今的「通史」，而不是班固的「斷代史」，更重要的是，魯迅的史觀採用達爾文進化論的思維，使其史觀帶有演化的特質，也正因為這種進化論的框架，讓魯迅得以連接古往今來全然不同的文類、文本與作者，譬如遠古的神話、傳說與六朝的志怪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但在進化論的史觀裡，它們可以是中國小說的胚胎和原型，又譬如明清時期白話小說當道，但也有像《聊齋誌異》這類的文言小說逆流而上，成為文言小說的經典之作，《聊齋》因而可被視為演化上的變異，就像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所說的：「我所講的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許多歷史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羸雜。」³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魯迅是以全體人類文明歷史的恢宏觀點來看待中國小說的發展的。魯迅認為中國歷史只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而小說又只是文藝發展的一種，因此中國小說自然也只是世界文藝發展的一個環節。從此觀點來看，「中國小說」作為一個獨立概念有其普世性的內涵。但魯迅又認為中國小說的發展過程與

西洋小說不同，因為前者有其發展上的獨特性，他用「反復」和「羸雜」來解釋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反復」和「羸雜」指的就是中國小說進化速度不一的特殊現象，從某個角度來說，這種說法或許是魯迅面對當時新舊文化雜陳所採取的權宜語彙，但也透露出其對於中西小說線性發展的達爾文式想像。

不過也因這樣的想像，強調「反復」與「羸雜」進化史觀的魯迅，讓他得以同時肯定中國小說的普世性與特殊性，因這種進化史觀讓原本屬於不同時代、不同脈絡的文本與文類有了連接的空間，一個連續性的、單一的文化脈絡在概念上因而成為可能。也因這樣一個文化脈絡坐落在對人類整體文明體系的想像中，普世性與在地性的想像有了連接的空間，從而讓「中國小說」得以和其他不同「國」的小說區分開來，而有獨立清晰的概念。換言之，魯迅透過對於「中國小說」的歷史建構，讓小說這個中文語彙開始有了明顯的雙重指涉性，《中國小說史略》的標題或許點出了這個事實：這是一本「中國」小說史，不是其他「國」的小說史；言外之意，在中國小說史的範圍之外，還有英國小說史、美國小說史、法國小說史、日本小說史等等不同小說史，而這些不同國的小說史都被涵蓋在更寬廣的世界小說史的範疇中。

為更進一步呈現小說作為現代文類之雙重指涉的論述基礎，本研究也企圖梳理 1905 年以降晚清知識界所逐漸浮現關於「世界語」（Esperanto）的討論與呼聲，借此重新審視 1917 年開始的文學革命和漢字改革之間的深層關係。如果說五四一代文人所代表的新文學運動最大的成就，在於以世界的格局建立具有國族意識的文學作品，以全球進化史的角度撰寫俱有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觀，那麼某種對於「世界性」、「普世性」的想像與追求，應該是造成這股國族文化史書寫風潮的主要力量，而形成這股力量的媒介除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外，或許就是在 20 世紀初被引進中國的世界語運動。

過去論者多認為世界語運動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的現象，不能算正式的語言改革運動，其對新文學運動也沒有實質的影響。本研究則持相反之意見，認為世界語

2 參見魯迅，《魯迅全集略》，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 同註2。

運動乃是新文學運動與漢字改革的先驅，甚至是與之並進的思想潮流。事實上，民初知識界關於世界語的論述一直持續到新文學運動末期，甚至到 1930、40 年代仍持續左右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改造、語言變革的想像，世界語論者所追求的世界一體與文化大同的精神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中國文學的實踐當中。

倘若沒有世界語論者在晚清所造成的一股風潮，五四的知識分子又如何理所當然地認知到語言改革、文學革命和新世界觀三位一體的緊密關係？若說五四知識分子最大的特色在於逐漸轉向以文學書寫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或許晚清的世界語運動者早已提供了一個以「語言」介入國際現實的想像空間。本研究認為，世界語運動不僅為晚清民初的知識界帶來一個新世界秩序的想像，它更打開整個 20 世紀初中國文學／文字改革浪潮中「文學作為一種世界語言」的想像空間。這種對於「文學語言」必須同時是本地的又是普世的想像，為原本來自西方的現代文類在中文語境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礎。

五、預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希望透過現代文類雙重指涉的建構，重新描繪現代中國文學興起的過程。過去論者往往從敘事模式、文體演變或中西日文化譯介的角度來探討「小說」概念在晚清民初的演變，本研究則認為這樣的提問仍預設了當代中文語境下的「小說」觀，即，中國「小說」有其歷史、淵源和成長演變的階段。然而，這種現代文學史觀的架構有其論述前提，本研究的目的就在分析當代中文語境中「小說」概念的論述基礎。透過晚清民初知識分子對於文學史的建構、世界語的想像及對於在地性／普世性的理解，本研究希望做出如下的命題：作為現代文類的「小說」乃建立在其「雙重指涉性」上，也就是說，作為現代概念的「小說」必須是中國的，但也是外國的（非中國的）；是在地的、獨特的，但同時是跨文化的、普世的；是現代的，但也是古代的。這種雙重指涉才是構成當代文類的第一要素。本研究希望對中西文類比較與對譯的問題提供另一種分析方法，以解釋中國文學現代化過程中語境轉換的問題。

「漢語方言層次研究」專輯徵稿啟事

《漢學研究》（季刊）擬於 2018 年 6 月出版「漢語方言層次研究」專輯，由臺灣大學中文系楊秀芳教授籌畫主編。截稿日為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本專輯的規畫構想及目的說明如下：因為移民遷徙、族群接觸等因素影響，漢語方言形成多層次異讀的現象。方言層次的構成與性質十分複雜：層次間可能以疊置方式完成其競爭、取代的過程；也可能形成「混血音讀」，而使層次分析更見困難。競爭消融的結果可能只殘餘少數異讀，難以利用來建立對層次的認識；也可能藉由方言的拼合而找出行將消失的語音層次。如何合理的解釋層次異讀材料，以建立對方言史的認識，是方言研究重要的課題。此外，利用方言構擬古語時，層次異讀材料應當如何處理，層次間的對應關係應當如何釐清，才能使古音的構擬更見合理，這些都是必須深思的問題。本專輯之籌畫，目的在邀集學者共同深入探討此一課題，以開發新的研究成果。

詳見漢學研究中心網頁 <http://ccs.ncl.edu.tw> 最新消息。